

守点燃炸药，接着按照板垣征四郎发布的命令，各路进军攻击，“九·一八”事变爆发。继而本庄繁下达全面进攻的命令，驻东北各地的日军部队以闪电式的速度逐次向沈阳、长春等地发动进攻，以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等法西斯军人的行动为启端，日本帝国主义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第一把火。

轰击北大营的炮声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战争的开端。板垣征四郎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九·一八”事变中占有重要地位并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9年）

桥本虎之助的侵华活动

廖远

（一）

桥本虎之助，东京市人，1883年生。190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翌年任骑兵少尉。191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日本驻俄国大使馆附武官辅佐官、陆军中央部参谋本部附、参谋本部课长、东京警备参谋长等职。1929年晋升为少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积极支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9月28日，受陆军中央部委派携同远藤三郎、今井武夫、西原一策等人组成桥本班，到中国东北，负责陆军中央部与关东军的联络工作。当时关东军首脑及参谋部正在策划扩大侵略与筹建伪满傀儡政权问题，桥本虎之助支持这一行动。他向关东军解释陆军大臣

的方针意图，说“不扩大方针”只有政治意义，并不妨碍军事上的进兵扩展到必要的地点。这即明确告诉关东军可以继续扩大军事侵略活动，从而使关东军受到鼓舞，更加快了军事侵略和筹建伪满政权的工作。

(二)

伪满傀儡政权建立后不久，桥本虎之助接替三宅光治出任关东军参谋长。1932年6月，他在日本殖民者拟制的一系列殖民统治方案的基础上，炮制了一个《满洲国指导要领》(草案)，提出了控制伪满政权的基本政策。《要领》提出的“方针”是：“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是要使伪满洲国变成适应日本侵略需要的独占殖民地。《要领》提出的要点共7条，大致内容为：

1. 为实行日本对伪满的殖民政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而“专使关东军担任其任”；在实际进行中，要努力保持伪满政权“为一独立国的体面”，即在伪满洲国的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

2. 日军常驻伪满，担任伪满国防任务，伪满国军只担任维持治安，并要“减至必要的最小限度”。

3. 日本应迅速承认伪满洲国，将来将附属地等行政权也交给伪满洲国。

4. 伪满外交要和日本采取一致的态度，对苏俄，争取承认伪满，但要防止扰乱；对中国，协助日本扩大侵华活动；对欧美，实施“消极的门户开放的机会均等主义。”

5. 伪满的“铁路、主要水路、港湾和航空”，由日本加以“管理”、“委托某公司”(即满铁)“经营”。

6. “一般产业开发”，由伪满“自行承担计划统制”、“关于

制铁、制钢、炼油、重要煤矿、电力、轻金属、烧碱、硫酸工业”等重要“产业”及日本“农业移民”，“由关东军加以统制、指导”，并由伪满及直接委任的公司加以经营和实施。

7. 关于日本与伪满的关系，提出5项具体要求，主要有：日本对伪满的要求事项，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驻伪满大使）转交给伪满实行；其主要事项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向伪满执政或国务总理提出，其他一般事项，以关东军参谋长的名义向伪总务厅长官提出；伪满政府的重要政务，不许脱离日本的监督，伪满国务会议需要决定的事项，在参议会会议提出前，必须由“总务厅长官向关东军参谋长通报”，取得关东军的认可；“日本人参议应该经常领会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参加参议会会议，加以指导”等。

总之，桥本提出的《满洲国指导要领》是从外表上把伪满打扮成“独立国家”，而在内部通过关东军的“幕后指导”，通过以伪总务厅长官为核心的日系官吏来具体实施的殖民统治政策。这一政策，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以此为基础，日本内阁于1933年8月8日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其内容大体与桥本的《要领》相同，只是更加明确，更加具体而已。

此外，在桥本就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还协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支持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片仓衷等纠集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的军国主义分子筹建伪满协和会的工作，主张将协和党改成协和会，并在1932年7月15日，伪满协和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协和会的名誉理事。

（三）

1932年8月，随着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离职，桥本虎之助也离开了参谋长的职位，被调任新成立不久的关东宪兵队司令

部的司令官。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是由关东宪兵队于1932年6月改成的，这一改变，使关东宪兵队脱离了与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隶属关系，转为关东军作战序列，并由军政宪兵（敕令宪兵）变成军令宪兵。桥本上任后，对宪兵队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组与扩大，将原属关东宪兵队的7个宪兵分队，改成奉天、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锦州等5个宪兵队，下设17个分队。1932年末至1933年初，又编成延吉、承德等宪兵队。同时，宪兵人数也不断增加。

接着，桥本虎之助又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支持下，确立了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对在中国东北的日本警察的统一指挥权。即在1932年10月，由关东军司令部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全满警务会议，会上制定了《在满警务机关业务统制要领》，规定：“关东局警察机关及外务省警察机关，有关治安方面的警察业务，要受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指挥”。并决定，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临时兼任日本驻伪满大使馆和关东厅的警察部长。两个月后，即在1932年12月23日，桥本又根据关东军制定的《在满警务机关业务统制要领》，制定了《在满警务机关业务统制规程》，更详细地规定了关东宪兵队，对日本警察统制的具体办法，这便进一步强化了关东宪兵队在中国东北的警察权，和在警务方面的指导地位。这些规定曾遭到在满日本警察的强烈反对，直到1934年底岩佐绿郎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时才得以解决。

随着关东宪兵队权力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和日本在东北警务机构的统一，必然加重了对东北人民的残酷镇压与迫害。在东北各地，密布着日本宪警，他们清查户口，私闯民宅，拆查信件，刺探情报，监视群众，收缴枪支，侦察、镇压抗日活动，犯下了许许多多的罪行。作为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则是从事这些罪恶活动的罪魁祸首。

(四)

1933年8月，桥本虎之助离职回国，回国后转任日本陆军中央部参谋本部总务部长，晋升为中将军衔。1934年任陆军次官，1935年任对满事务局参与、近卫师团长。当年7月退役，被编为预备役。1937年7月，伪满实行机构改组，桥本虎之助又来东北特任伪满参议府参议、副议长。伪参议府虽然在伪满机构中不占主要地位，但桥本则能经常领会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对参议会议加以指导，使日本殖民统治者制定的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得以顺利通过。

1938年2月，伪满协和会改组，桥本虎之助又兼任了协和会中央本部的本部长，一直到1941年4月离任。在任期间，他主持伪满协和会按照修改后的章程、本部规则，加强了自身管理和思想统一，增强了协和会的反动职能，使协和会的工作范围扩大为精神、协和、厚生、宣德达情、组织、兴亚等6项。这样，就使协和会对日伪当局所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都加以配合，基本上实现了与伪满政府的“二位一体化”。进而，使协和会这一官办的法西斯组织，成为配合日伪当局镇压、破坏抗日活动，大造反动舆论，蒙骗与毒害民众特别是青年，残酷地压榨、奴役与搜刮东北人民的得力工具。

1940年6月，伪皇帝溥仪第二次访日，回来后，捧回了日本天照大神的三件复制神器，并在伪宫内府东南隅修建了供奉这三件神器的“建国神庙”，在南岭修建了作为“建国神庙”摄庙的“建国忠灵庙”，供奉所谓为建立伪满而死亡的日伪军官兵的“灵位”。为此，还设立直接隶属于伪皇帝的祭祀府，专门管理对“建国神庙”及摄庙的建造与祭祀工作。当年7月15日，由

伪皇帝任命桥本虎之助为祭祀府总裁。桥本就任这一职务后，利用其方便条件，十分卖力地宣扬日本天照大神的“至高无上”，企图用这一日本宗教来奴化、毒化与同化中国东北人民，实现日本殖民者在东北推行“皇民化”的险恶用心。任职期间，他不仅组织日伪人员大搞祭祀活动，频繁宣扬“惟神之道”，企图使广大东北人民改换祖宗，成为日本天皇的“子民”。他自己也于1941年10月11日的《盛京时报》上发表《我国祭祀本义渊源在惟神》的文章，宣扬伪《国民训》中所说的伪满“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至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要求东北人民承认日本天照大神作为新祖宗的地位，彻底认清“建国之本意与政教之渊源，锻炼身体，虔诚奉神”。不仅如此，他还与日伪当局有关机构，制定了《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强迫东北人民孝敬天照大神，经常向日本天皇、伪满皇帝遥拜，举行各种活动；甚至举行结婚仪式也要参拜或祭祀“建国神庙”。如稍有不顺从，就会视为“大不敬”，轻者处罚，重者逮捕、监禁、判刑。因此，使东北人民蒙受了灭族灭种的欺凌和深重的民族灾难。但桥本本身却不真正相信这一套，也不忠于天照大神，如1945年8月17日，伪满参议府召开会议讨论伪皇帝的《退位诏书》初稿时，桥本发现里面写有“仰承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的套语，便哭笑不得地用笔把这句话勾掉了。

※ ※ ※

从上述一些情况看，桥本虎之助在中国东北将近10年期间，无论在政治、军事，或思想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少的殖民侵略活动，可以说他是一名侵略中国时间较长，范围较广、罪恶较多的日本殖民统治者。